

回憶北京十七年

鄭天翔 著



回忆北京十七年

一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
要求我们的工作

郑天翔 著

北京出版社



B66624...

内 容 提 要

中顾委委员、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同志,“文革”前,曾长期担任北京市的重要领导工作。他在这部内容翔实、政治性回忆录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大量生动事实告诉世人:当年,由一批忠诚而干练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指挥部”,率领北京市广大党员、群众,为新中国首都的诞生与发展,付出多少心血,赢得哪些骄傲,留下什么遗憾。今天,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读者,尤其是北京的同志们,一定会从中悟出道道来。

回忆北京十七年

Huiyi Beijing Shiqi Nian

郑天翔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口)

展望印刷厂印刷

*

32开,1.68厘米,32页,3.25印张 85,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

ISBN 7—200—00985—7/K·92

定 价: 2.3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都北京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的支援下，经全市广大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建国四十周年之际，目睹我们国家和首都那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谨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敬意，对已经去世的对北京的革命和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们，寄以深切的怀念。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不知道有多少革命前辈、革命先烈把他们的血洒在北京这块土地上。他们为中国各族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畏险阻，前赴后继。他们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新的北京市委于1948年12月组建。彭真同志任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副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市长。李葆华同志任副书记。1949年8月，叶剑英同志南下，聂荣臻同志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中央政府成立后，李葆华同志调水利部，刘仁同志于1950年任副书记。北京的接管工作如建立人民政权、摧毁反革命残余

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交通、教育、文化等，在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和其他领导同志主持下，进展得很顺利，取得了许多经验。现在，入城初期的主要领导同志中的彭真同志、聂荣臻同志、李葆华同志依然健在；刘仁同志在“文革”十年内乱中早逝了；我们敬爱的叶剑英同志逝世也将近三年了。从1955年6月，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委的领导机构以后，到1966年初，先后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的十二位同志中，有七位已经去世。他们是刘仁、邓拓、陈鹏、范儒生、陈克寒、冯基平、贾庭三同志，健在的只有彭真、张友渔、万里、赵凡同志和我五位了。刘仁同志、邓拓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直接牺牲的。在十年内乱中直接牺牲的还有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和著名的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同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同志和担任过市委常委、大学科学部长的吴子牧同志。陈鹏、范儒生、冯基平、陈克寒同志和曾经担任过市委常委的杨述同志倍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而过早地陆续离开了我们。为北京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付出辛勤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十年内乱中死于非命或因倍受摧残而过早地离开我们的同志，还有许许多多。这是我们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对首都的贡献将永垂不朽！

“文革”前十七年，北京市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犯过错误；听到过赞扬，也受过批评。总的说，党的威信是高的，党和政府的工作效率是高的。对此，北京市

人民和干部是记忆犹新的，在实践中是有亲身感受的。1964年7月间，毛主席从外地回京，在丰台车站，在他乘坐的列车上，对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和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1965年9月11日，毛主席出席全国第二届运动会的开幕式时，跟刘仁同志说：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不错。北京市委没有因为人民的拥护和中央、毛主席的赞许自满自足，故步自封。市委不断地同先进地区比，找差距，找缺点，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鞭策自己，带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市委的指导思想是：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是北京市委贯穿十七年的指导思想。彭真同志多次讲这个问题；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在“文革”前的三次代表大会和多次工作会议的报告和讲话中，反复地讲这个问题。市委按这个方针进行检查和布署，要求自己，要求各方面的工作。《北京日报》、《前线》按这个方针进行宣传报导。在1963年11月间的工作会议上，彭真同志再一次对这个指导思想做过解释。他说：“北京的工作用什么标准来要求，还是要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不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不准备不断革命，共产党员本身就发生问题。”一个最高标准，一个客观上可能。这决不是鼓动大家盲目地、片面地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或其它方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更不是鼓励同志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以首善之区自居；而是“根据党的方针

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的自觉的努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的速度，健康地前进”。这里，既反对“不力争上游，安居中游，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也反对“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这是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的指导思想。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不是各个方面）回顾一下“文革”前十七年（我只参加过十三年）的北京市委是怎样贯彻这个指导思想的。

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采取严肃认真、高度负责的态度

第一，对于重大问题、重要工作，抓得紧紧的，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务必抓出一个结果来。

我党一进城就碰到如何把一个乌七八糟的旧北京改造成一个安定、文明的新北京的问题。军管会和市政府入城后，立即抓紧接管，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摧毁保甲制度，进行反动党团登记，收容流散的国民党官兵，严厉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埋伏和派入的特务间谍；同时，开展民主改革，摧毁封建恶霸反动势力。解放前，北京的“地”不仅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分割了、霸占了，就是“天”也给分割了、霸占了。那时候有所谓“三霸一虎”，即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

和北方一虎，还有号称能“飞檐走壁”的惯匪“双飞雁”等等，人民政府立即对其进行镇压。对封建把头制度，对统治建筑业、粪业、水业工人等等方面的霸主、把头等，人民政府立即宣布取缔，对罪大恶极的霸主给予镇压。这样，人民民主的新秩序迅速建立了，生产力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了，经济、文化、教育、科研、统战等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旧社会的渣滓和遗毒也不是一两次就能清除和清洗掉的。1951年，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北京市在进行郊区土改、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先后依法处决了几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并对其他数以千计的犯有严重残害人民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依其罪恶大小判以徒刑；紧接着，又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镇压其中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教育改造绝大多数误入歧途的道徒。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既大张旗鼓又谨慎细致。凡属重要案件、重要案犯，彭真、刘仁同志都亲自过问，市委逐案研究，征求各界人民代表的意见，并且把案卷放在中山堂由各界人民代表审查。市委随时向中央请示报告镇反运动的政策、策略，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采取了对不需要立即执行的死刑犯实行“缓刑二年、以观后效”的政策；同时，加强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工作。这样，就稳、准、狠地打击了敌人，并依靠政策和震慑的威力，感召、分化了另一部分敌人。首都的社会治安进一步稳定，不仅浮在面上的敌人坠入

法网，就是狡猾至极的派遣特务也难以埋藏，它们的破坏行动在开始前就被粉碎了。1951年，美特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妄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杀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黑手一伸出来就被抓住了。看到那些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受到应有的惩罚，广大人民欢天喜地，拍手称快。在镇压反革命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根据彭真同志提议，全市各基层单位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落实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同时，加强了派出所的工作，并使之密切联系群众，贯彻执行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949年和1950年，北京刑事发案率分别是万分之二十五点九和万分之二十七点五，到1955年降为万分之十四点八。随着工作的加强，1958年以后，又下降到万分之四五左右。1961年暂时困难期间，社会治安有些波动，刑事发案率曾经达到万分之九点七，经过努力工作，很快就下降了。1963年到1965年，刑事发案率稳在万分之三左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没有反革命破坏，没有特务、间谍、敌视党和国家的分子的破坏，没有刑事犯罪，那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敌人的活动能不能随时掌握，对于已经发生的案件能不能及时破获。党、政府、公安部门，正是在这方面坚持不懈，狠下工夫。破案率五十年代中期为百分之六十多，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前，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中，大案的破案率，1958年到1965年一直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三年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市委并没有满足于现状。1958年以后，彭真同志又多次提出：对社

会动向和敌情要了如指掌，要了解得一清二楚，就如同看一块玻璃板，底下压着是什么，要看得清清楚楚，如同看一块水晶石，里边有什么疵瑕，要一目了然；要牢牢掌握社会治安和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仅仅打击和镇压反革命和犯罪是不够的，还必须清除旧社会留下的毒素和垃圾，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移风易俗。1950年全市彻底取缔妓院，解放被污辱被损害的妇女，惩治作恶多端的老鸨。大多数妓女经过教育和生产劳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还成为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通过取缔反动会道门，党和政府向人民进行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并严禁吸毒贩毒，严禁赌博，对社会丑恶现象一露头就打，一发现就管，年年管、月月管，坚持管，坚持改造，决不允许其蔓延。与此同时，在干部中，在人民群众和学生中，普遍进行社会发展史、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表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纪念革命先烈，号召人民向他们学习；树立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好人好事光荣，坏人坏事可鄙的观念。人们的是非观念变了，社会风尚变了，新的道德标准树立了，社会主义中国首都的新的精神风貌出现了。

再如，如何把一个臭气薰天的旧北京改造成为一个清洁卫生的新北京。进城以后，市委明确了市政建设为中央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并一直坚持下去。解放初，北京城内垃圾粪便到处堆积，有的地方的垃圾是明清留下来的，积存了几百年，污水横流，疮痍满目，疾病丛生。封建统治、北洋军阀、国民

党政权以及日寇的反动透顶、腐败透顶的实质，于此可见。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清除垃圾，整治环境。市政府用了一年时间，清除了垃圾粪便将近四十万吨。从1950年开始陆续整治了八条龙须沟那样的臭水沟；整修恢复了业已坍塌或淤塞的原有下水道系统(全部为300多千米，到1956年陆续整修280多千米)；重新设计和修建新的下水道系统(到1956年达280多千米)，并且第一次修了污水处理厂。疏浚治理河湖水系，把一些杂草满地，蚊蝇滋生的臭水潭一个一个地挖泥堆山，引水植树，建设成新的公园。今日的陶然亭、龙潭湖、紫竹院等公园，就是用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年复一年地、一锹一锹地挖出来、堆起来的。在持续不断地大搞卫生的同时，市委市府抓紧了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友谊、儿童、积水潭、宣武、朝阳、妇产、结核病、传染病等大医院的建设以及同仁医院的扩建，都是在五十年代，在市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还建立了区的和区以下街道的医疗卫生分支机构并将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向工厂、郊区农村扩展，建立了基层爱国卫生组织，加上中央和部队的医疗卫生机构，全市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医疗卫生网络。医疗卫生工作，执行了预防为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西医和中医同时并重的方针。在此期间，又大力发展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材。由于经费不够，第二医学院当时不可能盖许多房子，设许多试验室，请许多教授，于是就实行学校和医院挂钩，专业课在相应的医院讲授、实习的办法，走出了一条教学密切联系实际的路子。刘仁同志熟悉许多著名的医生，亲自给他们出研究题目，创

造工作条件。友谊、积水潭、妇产医院的院址也是刘仁同志亲自选择的。卫生工作的目标是防病、治病，治病的重点是常见病、多发病，同时，有重点地向世界先进水平进军。一些重要医院、知名专家都确定了进军的具体目标。到1956年，北京的医疗卫生组织，已经由旧社会留下来的六十一个机构、三千张病床、四千二百多医护人员，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个机构、一万七千多张病床、二万七千多名医护人员的规模。三年恢复，四年建设，远远超过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几十年、几百年，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1952年开始，全市广泛地持续地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成为全民的任务，检查和落实爱国卫生成为党政军民机关负责同志、各级主管部门和全市人民群众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的重要工作之一。“文革”前几年，北京被誉为“无蝇城市”（说无蝇，当然是形象地极言其少），绝大多数传染病迅速被控制了，有的停止发生了，有效地普遍地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护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教育、科研的发展。

又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首要的问题，是精简几十万职工回到农村，压缩城市人口。1961年，刘少奇同志听了市委精简职工的汇报，指示我们要抓紧。他说，抓紧了就主动。周恩来总理对于精减在京中央机构以及在京新设机构，包括新设科研机构、各省市驻京办事机构，都亲自为我们把关。当时，职工招多了，主要是由于我们主管工业交通等方面的人头脑发热，缺乏综合平衡。

精简工作则牵动了彭真、刘仁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刘仁同志给职工干部讲经济形势，讲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讲为什么要精简回乡的道理，并对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亲自研究，亲自掌握。贾庭三等同志和工交口的其他同志一道，一个厂一个厂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62年4月，全市共精简职工四十二万余人。压缩基建战线是精简职工、减少财政支出和缓解市场压力的关键。开头，我自己就有舍不得割爱的情绪，而且就全市来说，中央项目、地方项目、生产项目、生活项目等等，究竟压哪些，保哪些，矛盾很多。市委反复讨论，中小学必须保，职工宿舍必须保，其余则要坚决压，北京市除全国性的十大建筑^①外，很少搞楼堂馆所。当时，主要是压缩工业的建设规模，市委一决定，说下马就下马，说关停就关停，不得拖泥带水，不得阳奉阴违。任何人不得在市委的决定以外开口子，来个首长条子工程。市委强调，一切要从全局考虑，态度要十分坚决。否则，这个要照顾，那个来说情，基建战线永远压缩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就很难奏效。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北京工业基建投资二十多亿元，平均每年七点八亿元，1961年降为六亿八千多万元，1962年降为一亿六千八百多万元。在这同时，所有工交基建企业认真贯彻七十条，按邓小平同志指示，强调做“笨工作”，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基础工作，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同时，根据邓小平同志关

① 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钓鱼台迎宾馆。

于实行专业化大协作、打破大而全和小而全的指示，我们建立了全市电镀中心和锻压中心进行试验。大中小学分别贯彻六十条、五十条、四十条；农村贯彻六十条；科研贯彻十五条。各项工作按中央指示，走上充实提高的道路。

煤炭和粮食问题解决的好坏，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全面好转有决定意义。1961年9月，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找河北、山西主管工业的同志和我研究煤炭问题。晋冀是调出大户，北京是调入大户之一，也有调出任务。生产多少，消费多少，为什么消费那么多，都要一笔一笔地向总理汇报得清清楚楚。因为有十来万吨煤不能平衡，会议一直开到过了午饭时间还不能散，邓大姐给我们拿了点饼干，总理跟我们三人边吃边算，直到算清落实为止。因分配北京的煤还有些缺口，在传达庐山会议的市委工作会议上，市委号召大家当年冬季取暖迟烧五天火，翌年早停几天火，咬紧牙关，共渡困难。那年，煤的紧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在最困难的那几年，粮食也是周总理亲自过问，亲自最后确定分配调拨方案。1962年第一次从国外进口小麦，是散装的，周总理亲自指示我们去秦皇岛接运，避免洒失。粮食方案定了以后，市委就要仔细研究日子怎么安排。刘仁同志和主管的同志一笔一笔地算细账，哪些是必保的，哪些是可以节省的，哪些要妥善安排，都算得清清楚楚，既要保证城市人口的吃饭，包括菜农的吃饭，又要保证猪、禽、奶牛的饲料；既要算大宗的账，又要算小宗的账，例如蔬菜青黄不接时需要生产多少豆腐，生产多少豆芽，醋、酱油全市需要多

少，用多少粮食以及产储运中间如何减少损耗等等，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全面安排。数字算清楚了，刘仁同志就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仔细讨论。那时粮食供应的缺口就是这样用精打细算的办法解决的。不知稼穡之艰难的人会以为那种账何必那么细算，市委何必讨论粮食供应的具体方案。殊不知，在那种情况下，它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关系全局的大事，市委不能不做详尽研究并保证方案的实现。这样做，粮食是宝中之宝，更为人理解了；必须节约粮食，就更引人重视了。“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成了社会公众的舆论和道德标准。当时，把馒头、米饭随便往垃圾筒里倒的行为，不管在工厂、学校、机关、部队，也不管在大饭店、小吃店，都是可耻的，可鄙的，都要受到人民群众严厉的谴责。

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时，我们重新受了“农业是基础”和“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教育。在我国，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大量农村劳动力不适当地、过多地离土进城，不仅增加了农民和国家的负担，而且直接削弱农业这个基础。服从全局，首先在压缩基建、调出调入重要物资这些关键问题上服从全局利益，否则就克服不了困难，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就实现不了，局部的利益也保不住。事实再一次教育我们，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毛主席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七千人大会决定在全党反对分散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不如此就不可能出现“三年调整，两年兴旺”。

以上举的几件事，说明北京市委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提倡的是什么样的作风。市委强调实干，

强调埋头苦干，强调讲求实效，不赞成做表面文章，不赞成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的作风。北京钢厂的工人曾经把那种爱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称之为“嘴力劳动者”。这种“嘴力劳动者”在北京广大人民中是不受欢迎的。

第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

市委明确指出：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各部、《北京日报》记者、《前线》编辑，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方面，彭真、刘仁同志给我们带了好头。在重大问题、新的任务决定之前，彭真同志总是要大家先做调查研究。他自己也亲自召开调查会或者到基层调查，启发大家畅所欲言。在调查研究方面，彭真、刘仁同志和市委着重一个“准”字：对每一个重要数字、重要事实、典型经验，都反复核对，务求准确。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或案子，彭真同志总要亲自查阅全部材料，然后才提出意见；对于向他报告的一些关键的统计数字，总要反复查问，而且记得很清楚，以后数字有了变化，就要再三查问是什么原因。刘仁同志往基层跑的最多，面也最宽，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他经常不打招呼，直接走到高炉或转炉前边跟值班技术干部和工人“聊”；走到麦地里、稻田边，跟基层干部、农业专家（如蔡旭等经常活跃在生产第一线的同志们）和农民“聊”；不断到学校里跟系干部和学生们“聊”。他也经常跟市委负责同志、同市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厅和各部委的同志们在一起“聊”。刘仁同志很会“聊”，跟拉家常一样，你一言，我一语。他有时将你一军，让你再去调查；有时故意说反话，启发

大家的思路。这样得到的往往是一些真实的情况和真知灼见。有些事情，别人说得似乎很有把握了他也不信，总要亲自去看一看。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工作的典型，是刘仁同志去石钢跟同志们“聊”的中间发现的。回来后叫《北京日报》负责同志和记者蹲在那里调查，对他们写的调查报告中的重要情节，一件一件亲自核实。《北京日报》记者对白云石车间的调查报告，市委审阅了，又叫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去复查，补充核实。然后，市委才正式做出在全市推广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工作经验的决定，在《北京日报》上公布。五、六十年代，刘仁同志亲自考察了北京市工农商各业的先进典型、劳动模范中的绝大部分，并叫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北京日报》的同志去周密调查，然后确定为典型。对先进人物、先进典型，不仅讲他们的经验和优点，也讲他们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浮夸不实之词，统统不要。典型树起来以后，刘仁或市委其他负责同志还要不断地去考察，找他们谈话，提醒他们不要骄傲自满，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因此那些典型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刘仁同志经常保持冷静的头脑，从不轻信，在他自己还没有考察清楚或考虑成熟时，对重要问题不轻易表态，更不轻易决定，宁可慢点，但要准些。肯定一些事或否定一些事，表扬一个人或处分一个人时，在别的同志说话以后，他往往要从反面或正面提出问题来跟同志们反复研究。他这样一提，往往暴露出我的考虑不周。每逢这种场合，我就感到自己容易轻信，了解情况不深入，许多工作中的失误就是由此造成的，而经刘